

# 胡適與巴斯德

作者：潘光哲

**作者簡介：**潘光哲為臺灣大學歷史博士，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胡適紀念館館長，專長為晚清史。

1 1925年5月，胡適與江冬秀的第二個愛情結晶女兒素菲，不幸夭折。失去了6歲稚齡的掌上明珠，對胡適的打擊實在不小，他卻好似竭力隱藏一番傷心。壓抑強忍，實非易事。在那年年底，當胡適讀到述說法國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生命史的《巴斯德傳》（*The Life of Pasteur*），感情終於被挑動起來，他寫信告訴夫人，讀這部書的時候，「忽然掉了不少的淚，手絹都濕了」。近30年後，胡適得悉友人陳之邁夫人身罹惡疾，致函慰問，又回想起當年的激動，說自己當年讀這部書「曾幾次掉淚」，連帶評價正因為有巴斯德的「奮鬥成功」，因此可以「有效的控制傳染病」。顯然，這部書描述巴斯德如何救助生命，增加人類福祉的貢獻，在在讓胡適傷情感懷不已。

可是，自稱「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the incurable optimist）的胡適，從來不會陷溺在「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心緒裡而不可自拔。大哭一場之後，胡適「願把金針度與人」，要將自己閱讀這部書得著的啟發，昭告世界。追尋科學，本來就是廿世紀華人知識群體共同謳歌吟詠的永恆旋律之一。在這闕雄偉的合唱曲裡，巴斯德是從來不會缺漏的音符；胡適更好似唱頌巴斯德的合唱隊伍裡最受人矚目的明星級歌手。從胡適個人想望科學的思想歷程著眼，他對巴斯德的吟唱闡述，猶如持續不斷的「固定樂思」（the *idée fixe*），縱然稍有

變調，卻是前後貫穿，總要將來自異域他邦的巴斯德，營構形塑為「科學英雄」，進而轉化利用，強調如何以巴斯德為典範，使得科學可以成為公民認



胡適夫人江冬秀與素菲（左）、思杜（中）、祖望（右）。攝於1922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識論 (civic epistemology)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讓科學在中國得以生根發芽，乃至花開滿園。不過，胡適彰顯表揚巴斯德，鼓動科學的用心，固然寄託國族前景能夠別展新局的理想期盼，卻也與他執著於如何在中國涵育落實「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信念，密不可分。畢竟，為了挽救國族危亡，在華人的文化世界裡，科學佔有不證自明並且儼若霸權的地位，世所公認。只是，科學的意義與價值，不該只局限於為國族命運而服務的範疇，甚至於成為權力的奴僕。怎樣避免這樣的窘境，述說胡適和巴斯德的這段因緣，應該深具啟發意義。

### 巴斯德進入民初知識圈

對中國知識人群體而言，巴斯德並不是絕對陌生的名字。至少早在 1890 年，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 (Young John Allen) 負責主要編務的《萬國公報》，就登出過由蘇格蘭傳教士韋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撰寫的巴斯德小傳。韋廉臣本來就是向中國讀書界介紹科學 (當時稱為「格致」之學) 而不輟的傳教士，過去他編寫的《格物探原》(1876 年初版)，就頗引發知識人的注意；此刻他則以巴斯德的科學發現為例，闡明「格致家」為什麼「大有裨於國家」的道理。只是，在韋廉臣筆下的巴斯德，更是位「一生自幼恭敬上帝，以救主耶穌為依歸」的人物，他還說自己曾親聞巴以「以耶穌為坊表，善與人同，一以增人之學問，一以免人之苦楚也」的教誨。說到底，韋廉臣介紹巴斯德的用心，還是藉之為例來宣揚天主福音的。

對比之下，將近 20 年後，目前生平情況還莫知其詳的鄺鳳鈞，於 1909 年在《紹興醫藥學報》發表的〈巴斯德傳〉，就沒有這樣濃厚的宗教意味，反而只強調「黴菌學為現今醫界之大問題，而巴斯德為發明黴菌之鼻祖」，因此特別介紹他的生平與貢獻，還說法國人「投票公定十九世紀之偉大人物，巴氏首選，拿破崙次之」，闡釋了他的歷史定

位。《紹興醫藥學報》由何廉臣、裘吉生等組織之紹興醫藥學報研究社創辦於 1908 年 6 月，被認為是近代最早的中醫期刊，是刊以「研究醫藥精理，發達神州，闡發神農聖學，保存天產利權」為宗旨，它的讀者則評價這分刊物確可「發明舊學，闡揚國光」，可以說實在是一分帶有文化民族主義的色彩刊物。出現在《紹興醫藥學報》的這篇〈巴斯德傳〉，引介其人其事，要旨雖與「聖學」、「國光」無關，正可顯示，借鑒「他山之石」，始終為建構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提供了無窮的動力。

1887 年開始創設至今依舊屹立不搖的巴斯德研究所 (Institut Pasteur)，是巴斯德的科學業績得到法國世眾肯定的標誌。在大清帝國時代就得以知曉巴斯德的中國知識人，目光所聚，當然也朝向這座宏偉的殿堂。晚清重臣李鴻藻之子李石曾，留學法國，卻加入了以推翻大清帝國為目標的革命黨隊伍。不過，「革命不忘讀書」，李石曾從 1906 年開始就在巴斯德研究所進行過大豆研究，證明大豆的營養成分與牛奶相仿，還可以替代肉食。憑著他的家庭人脈關係，李石曾得到地方大員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楊士驤資助，自 1908 年起在巴黎開設了中國豆腐工廠，以大豆為原料製造各種食品和用品。親歷其境的淵源，讓李石曾也興起了在中國創設同樣組織的宏願。畢竟，早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前，就曾有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醫科大學堂監督 (相當於北京大學醫學院) 的屈永秋與法國人某君「曾有此議，且巴黎之巴斯德學院曾贈儀器若干箱」，卻因政局變易，可未實現；及至與李石曾交好的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李石曾應聘任教，遂乃舊事重提，倡議在北京設立巴斯德學院，「中國出地基房舍，巴黎巴斯德學院贈給儀器，更由中法兩國合集資本為之經費」。只是現實所限，力所不許，所以他提議於暫先附設於北京大學，「于雙方皆有利，用費較省，且可得專精之人才」。李石曾的雄圖大略，當然並未實現；這番暢議，卻標誌



法國巴黎巴斯德研究所，攝於 1910 年。（維基與 Welcome Library, London V0049875）

著中國知識人不僅得以親身浸染於巴斯德的實驗室裡流傳的學術風氣，並願將之「移種栽木」，引介到中國來。

在「革命團隊」裡地位更高，影響更大的孫中山，畢業於醫學院，對巴斯德當然絕不陌生。所以，在他的演講裡，也不會忘記舉引巴斯德（孫中山稱之曰「柏斯多」）激勵青年世代，鼓動他們之「立志」，應該以他為典範，「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 科學英雄巴斯德

1922 年，正值巴斯德百年壽慶，在中國論壇上也出現不少紀念引介文字。例如，《東方雜誌》即刊出周建人的文章，稱譽他是「十九世紀的愛和平的，為人類服役的學者」。《東方雜誌》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社：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雜誌，在中國讀書界首屈一指，廣受歡迎；周建人是一代文豪魯迅的胞弟，那時正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平素就時常發表科普文章，如他同樣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過〈達爾文以後的進化思想〉等等，皆

為著例；正可想見，周建人這篇紀念巴斯德的文字，並非心血來潮的應景之作，而是和他始終願向中國讀書界引介這些科學名家及思潮的用心，密切相關。

還只是南京國立東南大學生物系學生的

劉咸，與周建人懷持同樣的心願。他感慨寫道，那時中國的中小學生猶不知巴斯德這位「科學界名星」之名，因此特別要在《科學》這分雜誌上介紹他的生平與貢獻。《科學》這分雜誌，是由中國留美學生任鴻雋、胡明復、趙元任等人於 1914 年在美國發起組織的中國科學社的機關刊物，一直向中國世眾傳播科學觀念，推動科學教育，普及科學文化而不輟，影響深遠；劉咸自己本人日後於 1935 年起更擔任《科學》雜誌的主編。還只是大學生的他，初試啼聲之作，恰正與時代的思想氣候，同流合拍。

劉咸的老師，中國科學社的要角之一：秉志，倡言科學對中國的意義和作用，更是屢屢取引巴斯德為例證。在秉志看來，面對中國的「萎敝」，想要「救國家者，必以提倡科學精神為先務」，巴斯德的做為，正是中國應該學習的對象：

……普法之戰，法國兵敗地削，幾於不能立國。巴思德氏憤其國家受人凌侮，奮力研究，彼一心唯知以科學之工作效力於國家。其結果也，研究所得，

關於實用者甚廣，法國人利用之，獲利極豐。法國竟能於扶死救傷之餘，充實國力，一躍復為世界之一等強國，此固屬巴思德氏之研究所致，而其精神實貫注於法國之社會。法國人民受此等精神之感化，幾於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皆奮發踔厲，以復興國家為唯一之目的。其國家所以轉危為安，轉敗為強也，科學精神之影響於國家者為何如乎？巴思德氏以研究科學，俾科學精神，影響於法國人民，其功烈既如此。……

在漢語裡，「科學精神」一詞是《科學》雜誌最早創用的，各家的理解詮釋，各有巧妙；秉志則取引巴斯德為例證，將「科學精神」與國族命運，串聯為一，證成它的重要性。

在秉志筆下，巴斯德的楷模意義，多重難盡。秉志述說道，巴斯德對於法國在普法戰役之後的復興，貢獻卓絕，他的科學成就，「在在皆足為國計民生之裨益」。可是，這麼一位「對於國家之大計及科學之發達，皆有極大之貢獻」的人物，其實本來「碌碌無奇」，正是因為得到好老師的「熱心啟迪」，從此「對於科學之研究，有不可言喻之熱烈」。所以，他強調身為「科學教師」，千萬不可「聊草塞責，負其學生」。言下之意，正是提醒中國的教育工作者，應該知曉巴斯德的成就乃是由於得到良師指引的道理，進而應該「見賢思齊」。秉志也強調，生物學與人類食衣住行等民生問題密切相關，中國應該借鑒其他國家發展的情況，即如巴斯德過往「研究蠶病，大著成效，蠶絲之業獲利極豐」，那麼，中國為什麼不仿效他的成績，「以生物學方法解決養蠶之問題乎」？

對憂心國族前景的中國知識人群體來說，提倡科學，發展科學，以導引國族未來方向，是他們的普遍關懷。巴斯德則是他們共同崇奉的「科學英雄」，願取之做為百代永式的榜樣，進而導引中國世眾走上理想的科學實踐之路。

### 「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胡適尊崇頂禮科學，宣講傳播科學的福音，畢生不渝。與同一時代的知識人一樣，胡適也將巴斯德視為「科學英雄」，不斷闡釋他的楷模意義。不過，面對廿世紀中國混亂動蕩的政治社會局勢，對胡適來說，巴斯德的象徵意義，更在於以之為典範，還能夠鼓舞世眾堅立「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志向，創造涵養「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可能。

自從 1910 年代中葉起，胡適在中國學術文化界「暴得大名」以來，一言一行，動見觀瞻。在那個政治社會變幻難度的時代裡，總能擾動人心的時事，胡適更往往必須回應表態。好比說，自從 1919 年「五四運動」以降，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此起彼落，又與自從 1920 年代掀起的「國民革命」相結合，青年學子以「救國」、「革命」為理想的滿腔熱血，屢屢洒落街頭。身為教育界領袖之一的胡適，固然肯定學生的一片赤忱熱心，卻對他們的行動只能投注於罷課請願，走上街頭，呼口號，貼標語，始終不以為然。在胡適看來，學生最該善盡的本分責任是「為己而後可以為人」，「求學而後可以救國」；與其在大街上搖旗吶喊救國，胡適主張：「青年學生的基本責任到底還在平時努力發展自己的知識與能力……只有拚命培養個人的知識與能力是報國的真正準備工夫」。國家民族復興的契機，全在乎此。

早在美國留學時期，胡適就懷持這樣的認識。1915 年，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廿一條」，引發軒然大波，被視為國族奇恥。對同在美洲大陸留學的同學義憤填膺起而抗爭的行動，胡適卻澆上一盆冷水，他發表公開信，聲言「我輩留學生」應該「各就本份」，善盡一己「讀書學習」這等「神聖的任務」。當袁世凱意欲稱帝登基，世論大嘩，胡適則說，不該為了這件事而耗費精力，「不如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他認為，「今

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因此，胡適回到中國之後，主張在從事政治改革之前，應先致力於文學、思想、社會的改造。例如，胡適向中國世眾介紹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用意即在於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要旨是「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並期望可以「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可以說，「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正是胡適持守不渝的信念，一番苦口婆心，期許繼起的學生世代，知所選擇。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學生的愛國血誠，頓時如山洪爆發，運動之勢，不可抑遏。胡適依復懷持這樣的認識，對學生諄諄言之：

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著大家去吶喊。吶喊救不了國家。即使吶喊也算是救國運動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吶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業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所以他特別舉引了哥德與費希特（Johann G. Fichte）的故事，說哥德「每遇著國家政治上有大紛擾的時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擾亂」；而費希特則在拿破侖攻破柏林之後，便著手計劃建立柏林大學，並發表《告德意志民族》演講，「忠告德國人不要灰心喪志，不要驚惶失措」。藉著哥德和費希特的例證，胡適提醒學生：

在一個擾攘紛亂的時期裏跟著人家亂跑亂喊，不能就算是盡了愛國的責任，此外還有更難更可貴的任務：在紛亂的喊聲裡，能立定腳跟，打定主義，救出你自己，努力把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

無奈的是，胡適的苦心，旋即遭受挑戰。署名「劉

治熙」的學生，就批判胡適「忽視民眾運動的意義」，說胡適強調「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的觀點，是將「民族解放的命運應完全取決於政府之手」，學生焉可置之不理？「固然學生參加此等愛國運動，一定要荒廢一部份的學業，但在中國現狀之下，我們也只能含酸茹痛的忍耐著，若照胡先生所說的完全不管時事，那只好去作德意志的學者去了」。面對批判，胡適重申立場，申說自己並不是「根本否認群眾運動的價值」，只是：

救國事業不是短時間能做到的，而今日學生們做的群眾運動卻只能有短時間的存在；救國是一件重大事業，需要遠大的預備，而跟著大家去吶喊卻只能算是發發牢騷，出出氣，算不得真正的救國事業。

#### 胡適讀巴斯德

胡適本來就認定自己「生平不學時髦，不能跟人亂談亂跑，尤不能諂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罵」。然而，不怕挨罵批判是一回事；如何強化自己的立論，以理服人，是另一回事。胡適好似對此縈繞於心，朝夕思之。當胡適讀到《巴斯德傳》，知曉巴斯德的發現確可拯救生命，造福人類，首先勾起他喪女之痛的傷感情懷；激動之後，胡適顯然認定，巴斯德身處國難世變，依復埋首於科學事業，竟可報效國族的故事，正與自己的信念，合拍共調。從此，在胡適的論說裡，巴斯德做為「科學英雄」的典範意義，不僅只限於「科學」領域而已。

胡適閱讀的這部《巴斯德傳》，原著執筆者是巴斯德的女婿華里藍道（René Vallery-Rado），胡適閱讀的是1924年出版的英譯本，目前還不清楚他是如何取得，何時開始批卷展讀的。胡適在書裡有不少眉批，諸如「治病方法」、「此一段真可佩服」、「大可佩服」、「Wonderful」等等，顯然，「開卷有益」，他在書末也留下了「Dec. 11, 1925，病中讀完」的紀錄，在在可以想見，這部書確實陪伴



■ 胡適藏英譯本《巴斯德傳》及其眉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胡適渡過一段時光。胡適慎重其事的在卷首蝴蝶頁寫下了「百年紀念本巴斯德傳」的題籤，不將它視為一般藏書，置諸書架，徒供蠹魚飽食，理有必然。

在中國讀書界，這部書由丁柱中譯出，以《巴斯德傳》為名而在 1936 年面世。丁柱中身為陶行知在 1931 年發起的科學普及運動「科學下嫁」的支持者，既寫文章相與呼應，認為巴斯德主張「唯科學能使人類趨近幸福」確為至理名言，也遺憾中國沒有像巴斯德這樣的大科學家，所以主張小學教師應該盡力引起小朋友的科學興趣，師生共同玩科學實驗的把戲，必可培植科學幼苗，充分顯示他對科學事業如何生根於中國的認識。丁柱中也認為，「科學家的科學生活的確能轉換青年們修學的趨向，改造青年們的人生觀」，因此耗心費神進行譯事，用心所至，顯然希望這部書的讀者「見賢思齊」，讓中國也能產生如巴斯德一樣的一流的科學家。

閱讀同一部書，關懷不同，得到的啟發，各有千秋；如何闡釋自己的體會，當然更因為意圖場合的不同，迥然有別。巴斯德做為「科學英雄」，胡適與丁柱中的認識，基本上並無兩樣；只是，胡適超越了「科學」領域，更願將巴斯德的典範意義，引申應用在中國青年世代身處國族危機之際，如何知所抉擇的現實層域。

## 巴斯德啟發救國之道

1926 年 7 月，胡適在北大學術研究會發表演講，首度舉引巴斯德為例證。胡適大概在演講時舉書示眾：

……這本書是法人巴士特（Pasteur）的傳。是我在上海病中看的，有些地方我看了我竟哭了。……

既持書為證，也向聽講者表明自己被是書內容所感動的閱讀經驗，胡適鼓舞激勵莘莘學子，就算現實世局紊亂無已，還是應該秉持「學術救國」的信念，希望學生把持得住，「不為時勢轉移，從根本上去作學問」，不要以為致力於此，所以不和同學走上街頭乃是「羞恥的事」。因為大學生最該盡的責任就是「研究學術以貢獻於國家社會」。胡適講述了巴斯德進行科學實驗與研究的故事，說他乃是「我們的模範」，他的一切做為，才是「救國」的真正道路。覆按胡適這篇演講裡涉及巴斯德的幾個段落，確實可見，都是他閱讀《巴斯德傳》的心得。如他說，巴斯德深感法國會兵敗於普法戰爭，被迫「訂城下之盟賠款五萬萬」，乃是因為「法國科學不行」，他遂發奮於科學研究，最後足以報效國家，因此「英人謂巴士特一人試驗之成績，足以還五萬萬賠款而有餘」。這句話即出自《巴斯德傳》一書引用的赫胥黎的話<sup>①</sup>：

赫胥黎在倫敦皇家學會公開演講時表示，「僅止巴斯德的發現，就足以償還法國在 1870 年時付給德國的五億戰費賠款」。

爾後，胡適在〈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一文裡直接明白的引述了這段話：

……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裡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

① 本文所引《巴斯德傳》內文，皆為作者譯自該書英譯本。

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胡適又說，巴斯德「辛辛苦苦的試驗四年才把這個試驗出來。謂其妻曰：『如果這不是法國人發明，我真會氣死了。』」《巴斯德傳》一書的原文是：

[巴斯德]帶著深切情感告訴家人：「我與合作夥伴們的發現，是屬於法國人的發現，真是最讓我感到欣慰的事。」

胡適讀到這段話，大概深有同感，還特別畫線註記。稍後，胡適又在另一場演講裡舉引巴斯德與牛頓為例，提醒聽眾，治學之道之一是應該力求廣博，事事留意，才能有所成就：

巴斯德……發明霉菌，研究得深了，那這一學問就牽涉到一切的學問上去。……因為他博，所以蠶病了，他可以治，酒酸了，或者醋不酸了，他也可以治，其實他並沒有研究過蠶、酒學，動物學家也許不能治，他卻能治。據說牛頓發明「萬有引力」，是因為見到蘋果掉在地上，我們也都看見過蘋果掉在地上，可是我們就沒有發明「萬有引力」。巴斯德說過（講學問我總喜歡說到巴斯德）：「在考查研究範圍之內，機會，幫助有準備的心。」牛頓的心是有準備的，我們則沒有準備。……

巴斯德的話亦可見諸《巴斯德傳》：

他[巴斯德]在里爾的演講的這句話：「在觀察研究的領域裡，機會僅只厚愛那些早就做好準備的心智」，特別適用於他自己……。

凡此數端，在在顯示，《巴斯德傳》這部書確實是胡適闡釋巴斯德的靈感來源。正因為胡適自己確曾受益於這部書與巴斯德的啟發價值，他日後甚至於不無激動的說：

……如果我有權，能夠命令諸位一定讀那本書，我就要諸位讀《巴斯德傳》……。

乃至當他在構思寫作「雜論西洋近代的文明」的計畫裡，也認定巴斯德是足以象徵「科學的精神與方法」的人物；胡適又稱譽巴斯德治學「不苟且」，如他研究蠶病，「一點不放過，一點不放過才能找出病源」，實是楷模。一句話，在胡適的思想世界裡，巴斯德具有多重的高度象徵意義。

### 世亂中的殷殷期許

然而，19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鐵蹄聲步步作響，1931年以後陸續策動「九一八事變」，製造「滿洲國」之後，直逼中國北方大地。在這樣的時代脈絡裡，學生運動被再度激發起來，青年學子再也按捺不住，學生運動捲土重來。胡適以為，中國實在不足以和日本決戰，總希望以外交交涉的和平方式因應，換取休養生息培植國力的可能。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引發的國難，胡適還是一本初衷，在不同的場合，依復徵引巴斯德而不輟。胡適或是以巴斯德為楷模，鼓勵青年學生就算「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卻絕對不要悲觀失望，應該要有信心，堅守「功不唐捐」的信念。因為「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就像巴斯德也曾飽受法國在普法戰爭失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的苦痛，只是：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獲了科學救國的奇跡了。

胡適宣講於中國南北大地，總是屢屢舉引巴斯



晚年的胡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

德。在廣西南寧，胡適舉巴斯德的故事為例，「證明科學可以救國」，呼籲青年學子選擇「求學而後可以救國」的道路；在湖南長沙，胡適贊譽巴斯德「相信真理，充分發展自己，專心去求真理」，實在是一位「先為己，而後為人，真真做到用科學救國的人」。爾後，中國歷經抗日戰爭的洗禮，百廢待舉，當 1947 年胡適重訪自己 40 餘年前讀過書的上海澄衷中學，面對母校的「小弟弟們」，他同樣講述了巴斯德的故事以證明「教育救國」的道理，鼓勵他們「在學校中努力向學」。總言之，在胡適的闡釋裡，國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想要尋覓出路，瞻望前景，巴斯德的抉擇與做為，才是青年世代應該引為借鑒的「科學英雄」。

遺憾的是，胡適的苦口婆心，未必都能說服廣大的熱血青年，甚或反遭怒目以對。當學生發動罷課的時候，有署名「將來殺你的人」的學生寫匿名信

批判胡適：

……在這樣危急的環境之下，凡屬熱血的青年學生，誰心中不比喪了父母還難過！激於愛國的熱情，放出一聲慘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學們的猛醒，這你能說是不正當的嗎？！這你能說是軌外行動嗎？倘若你以為這是不當，那你真是喪心病狂了！該殺的教育界的蠢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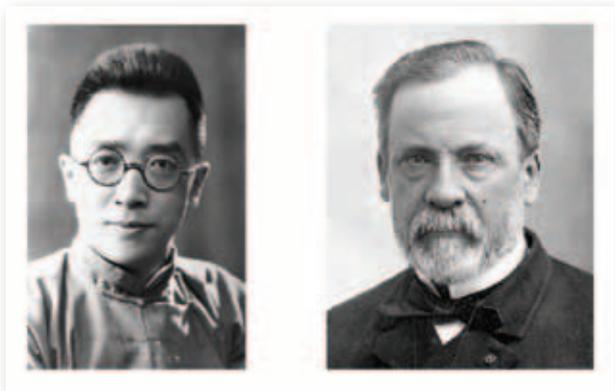
學生以非理性行為對他的反應，原因所在，胡適自己也心知肚明，他對周作人說：

……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但我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聽不聽由他們，我終不忍不說。

只是，胡適的期望，卻不是完全落空。例如，當時就讀於清華大學的吳晗，深感國事日非，在書齋與街頭行動之中徘徊不已，心緒痛苦不堪。不過，學術上深受胡適栽育的吳晗，大體上接受了胡適的意見，一心一意致力於史學研究，並未成為 1930 年代學生運動的弄潮兒。正如當時的好友千家駒回憶裡的印象：

他是胡適之先生的信徒，他看不起搞馬列主義的教授和同學，他整天埋在古書堆裡，……他從不參加學生運動，也看不起搞學運的人。

可以說，吳晗確實尊胡適倡言「把自己鑄造成器」的觀點，以個人的學術事業為努力的方向，終而在明史研究的天地，自成一家。又如，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附中高中部的夏鼐，時隔四年，又在清華大學畢業典禮上親聆胡適的演講。胡適兩度勉勵希望青年學生應該要懷持「功不唐捐」的信心，夏鼐不怎麼以為然：



胡適與巴斯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與維基提供）

四年前在光華時曾聽過他在畢業禮中的致辭。這次也不外那套陳話。說「自己有三張藥方，好比觀音賜予孫行者的三根毫毛，可以給你們將來救急用：（1）多找出幾個問題，以作研究；（2）多弄點業餘的玩意兒，在職業外發展自己的天才；（3）要有自信心，自強不息，不問收穫，但問耕耘。」實則根據自己這幾天的經驗，畢業即同失業，什麼也談不到。胡適所說的，依舊是局外人的風涼話而已。

不過，將胡適的苦心之言當作「局外人的風涼話」的夏鼐，選擇的其實是胡適期望於學子的道路。夏鼐感慨：「國難當前，書生已成廢物，所謂『文不像錄膳生，武不像救火兵』，還是幹自己的事情去好。」夏鼐所謂「幹自己的事情」，就是研究致知，因此他想撰寫〈上海製造局的編譯西書始末記〉，因為編譯西書是「中國當時『富國強兵』思想的具體表現，此種思想直到民國時還不衰，成仿吾學兵科，魯迅、郭沫若學醫科，胡適學農科，都是受這種思想的影響」。一介學子想要研究的主題，深富追溯現實處境的歷史根源的意義；日後夏鼐遠赴英倫求學，由歷史轉習考古，在中國考古學領域裡影響深遠。正可想見，夏鼐的認識和行動，基本上與胡適是相通的。

面對青青子矜，胡適始終懷持期許他們應該走上如何「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的道路，宣講

鼓吹不已，巴斯德的楷模意義，是他舉引而不倦的構成要素。胡適的諄諄之言，未必可以說服青年學生接受；他持守「功不唐捐」的信念，以吳晗和夏鼐為例，多少也可彰顯反映胡適播下的種子，多少還是有萌發茁壯的機緣（至於吳晗與夏鼐日後的思想轉向，自是另當別論）。

勢隨時轉。面對 1949 年的歷史變局，胡適當然無力回天。只是，對懷想科學在中國如何走上康莊大道的他來說，巴斯德的典範價值，不因之稍有減損。1958 年 4 月 10 日，身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與蔣介石之間的一番公開「抬槓」，就是最好的例證。蔣介石當天以總統身分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發表致詞，認為中研院是全國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所以希望中研院今後的學術研究方向，應該配合「反共抗俄使命」，並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的任務。身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卻當場委婉客氣而立場堅定的反駁了蔣介石的「希望」，既不認為中研院應有肩負起「復興」那不可證成的「民族文化」之任務的必要，復表示中研院的方向和任務，應該以學術自身的邏輯與需要為依據，巴斯德就正是他舉引的例子之一，從而證成真正的學術，「在反共救國復國上，的的確確可以有幫助」。所以，胡適認為，

我們的任務，還是應該走學術的路，從學術上反共、救國、復國……。

言下之意，要怎麼樣走「學術的路」，要想如何「從學術上反共、救國、復國」，其實是學術界自己的事，與政治領域的最高領導者無關；在學術的世界裡，蔣介石不會也是「一言九鼎」的領袖。聽到胡適一席話的蔣介石，視為對他的「侮辱」，竟爾「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可安眠」。知識人堅守的信念，即使在現實裡動搖不了最高政治權威首腦的地位，還是對他帶來了挑戰與刺激。

自從 1925 年年底胡適讀畢《巴斯德傳》以來，

宣講巴斯德的象徵意義，始終樂而不倦。在胡適的闡釋裡，巴斯德的楷模價值，不僅僅因為他是有助於播灑福音惠及世眾的「科學英雄」而已，更因為他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進而開創國族復興機運的典範人物。在胡適看來，只有青年世眾仿效巴斯德，「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努力涵育培養「健全的個人主義」，中國始有前景出路可言。

### 健全個人主義的典範

歷經知識人百餘年的引介宣傳，現下翻開華人世界的科學普及讀物，一定少不了巴斯德的名字；如同愛迪生、愛因斯坦等等，他在華人世界裡已經是猶如常識一般的人物，在公民認識論的天地裡，絕對佔有一席之地。當然，中國知識人頂禮崇拜巴斯德的科學貢獻和成就，將他闡釋為「科學英雄」，本是一種「英雄史觀」的展示；他們的精神智慧投注於斯，想讓科學在中國生根，終極關懷之所在，更是要藉以為國族命運展現新機。

其實，巴斯德在法蘭西也被標舉為民族英雄，同樣是法國自身國族建構的一脈動力。返觀歷史原來場景，巴斯德自己對現實政治根本漠不關心；但是，在法國第三共和初期兩極化的政治氣氛下，巴斯德可以是對立兩造共同接受的理想形象，尊崇景仰敬他的行動，更可以創造政治利益。左派傾向的群體，讚賞他是以科學賜福大眾的象徵人物；對立者則譽之為可以藉科學造福人類的偉大法國人。兩相合力，巴斯德竟被創造為世俗聖人。這樣說來，中國知識人超越時空的限制，發明巴斯德做為「科學英雄」的意義，和法國人所做所為的用心，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相較之下，胡適對巴斯德的詮解，獨樹一幟。在胡適看來，巴斯德的國族情懷，當然彰明昭著；不過，巴斯德不為一時的赤忱熱血而有所動搖，埋首於實驗室，致力於學術，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要將自己「鑄造成器」。巴斯德的抉擇，不僅確實可

以拯救國族危亡，猶且創造人類無限的福祉，實在是貫徹履踐「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典範人物。

當然，此際我們對巴斯德的科學活動的認識，早已超越了胡適（與其他先行者）。即如法國社會學家拉圖（Bruno Latour）的《法國的巴斯德化》（*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指陳，巴斯德的成功因素，在於他既能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網絡，引發世界的興趣與利害考量，又能將社會「實驗室化」而展示他的研究成果。可以說，胡適對巴斯德的詮釋，對我們理解巴斯德，未必具有真知灼見的參照價值。但是，胡適抗逆一時流行的世潮，苦心擘擬巴斯德的典範意義，還是值得再三沉吟。畢竟，科學發明，知識探索，應該可以超越國族疆界而造福於全體人類。在胡適的詮釋裡，創造巴斯德做為「科學英雄」的價值與意義，不會只是為了國家民族的理想前景提供精神動力而已，更在於他可以做為涵育培養「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典範人物。

在華人知識群體追尋覓求科學的歷史卷軸上，胡適始終佔有不容忽視的位置。只是，回顧胡適宣講巴斯德而不輟的歷程，正足以啟示我們，國族主義不必然是建構「科學英雄」的惟一標尺。∞

#### 延伸閱讀

► 潘光哲（主編），《容忍與自由：胡適思想精選》（2009），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本書結集胡適之精華文章及言論，並做系統性的分類。

► 位於南港中研院區的胡適紀念館成立於1962年，以胡先生故居為基礎，保持其起居風貌，並有陳列室展示其著作、手稿、照片等，不遠處並有胡適公園及其墓園。本文作者目前為胡適紀念館館長。另胡適紀念館網站中可虛擬參觀展覽專題，並有文稿、影音檔案可瀏覽。

<http://www.mh.sinica.edu.tw/koteki/>